

NICE
TO
MEET
YOU

007
ZHI
CHINA

知
中

SU
DONG
PO
issue

主会! 苏东坡

天才艺术家, 高品位生活家,
骨灰级文艺青年, 新派探险家,
好奇心发明家, 豆腐心毒舌,
元气淋漓乐天派, 自由的觉悟者,
无法定义的苏东坡,
这么有趣的灵魂,
宇宙间还有几个!

A
SUPER
GUY

林语堂

作家、学者、翻译家、语言学家



“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，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。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，一般而论，总是徒劳无功的。在一个多才多艺，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，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，倒是轻而易举。我们未尝不可说，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的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酿酒的实验者，是工程师，是假道学的反对派，是瑜伽术的修炼者，是佛教徒，是士大夫，是皇帝的秘书，是饮酒成癖者，是心肠慈悲的法官，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，是月下的漫步者，是诗人，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。”——《苏东坡传》

钱穆

历史学家、儒学学者、教育家



“苏东坡诗之伟大，因他一辈子没有政治上得意过。他一生奔走潦倒，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。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，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，他的人格是伟大的，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、琼州的一段。那个时候诗都好，可是一安逸下来，就有些不行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。东坡诗之长处，在有豪情，有逸趣。其恬静不如王摩诘，其忠愚不如杜工部。他们（苏氏兄弟）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，所以他们对于世务，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、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，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。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，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。但他们的另一面，又爱好文章辞藻，所以他们持论，往往渲染过分，一说便说到尽量处。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。”——《国史大纲》

钱锺书

作家、文学研究家



“在苏东坡的艺术哲学精华中，他直探问题的根本，从艺术作品转向艺术家的内心：按照他的看法，一个诗人应该身与物化，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学的表面色泽……至今还是空灵缥缈、精致纤弱的中国诗歌，在宋代变得丰腴结实，而它承负的思想更使它增加了分量，宋诗

王水照

学者、唐宋文学方向研究者



“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，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。人们对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，曾有‘苏海’之称……苏轼的诗、词、文、赋、书、画等等皆足名家，都是宋代文学艺术中的标志性成果……苏轼又是

多刻露的思想和直露的宣说，少言外之意、幽掩之美；而最恼人的事情也许是宋代诗人的博学 and 惯于隐喻，使他们喜欢大量用典使事，即使在中国诗人中也显得堆垛不堪。苏诗是宋诗中最‘真朴出自然’的……东坡是写赋的大家圣手，使赋变成了至今依然壮观的崭新文体，弃了旧赋家惯于向读者炫耀的靡丽繁艳，把庚信以来骈四俚六的僵硬的律赋改造成富于弹性的散赋。苏赋的节奏特慢，不同于其他诗文的疾速飞驰。比如，在《前赤壁赋》的开头问道：‘何为其然也？’节奏的推进伴着审思细商，仿佛摩娑着每一个字眼。”——《苏东坡的赋·序》（英译本）

一位复杂而难以评论的作家，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难点，同时也往往成为论争的热点和焦点。如政治态度的变法和反变法，思想上的儒释道关系，创作分期的划分，文化性格的特质和核心，这些已经或正在讨论的问题以及还将提出的诸多问题，就其繁多和复杂而言，在我国古代作家个案研究中也还是较为少见的。这些问题的存在，正是‘东坡世界’包孕丰富、深刻的必然反映，也是学术探讨与发展的最佳生长点，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。在我国古代作家中，能够持久地跟同时和后世人们建立起亲切动人关系者不多，苏轼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位。”——《苏轼研究·序》

孔凡礼

学者、苏轼研究专家



“苏轼的立身操守，受到了当代和后代很多人的赞扬和钦慕。‘东坡胸次广’，江河湖海，山陵田野，花草树木，乃至日月星辰，风云

包弼德 Peter K. Bol

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学者、
哈佛大学教授



“在南宋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北宋大思想家，有王安石、二程和苏轼等人。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，不太注意到苏轼，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

艾朗诺 Ronald C. Egan

美国汉学家



“苏轼经常努力（在诗中）表现关于世界较为客观的立场和观点，

雨露，都在他胸中。他对它们倾注着深厚的感情，歌唱它们，表现它们。他至诚待人，‘与人无亲疏，辄输写肺腑’。保留到现在的一千三百多通尺牍，就具体记录了这个情况。他正直不阿，在王安石变法初期，由于对新法的不理解，一再说自己‘方拙’，‘方愿迂阔’。他不肯‘少加附会’，以圆‘进用’。”——《苏轼诗集·序》

家，但是，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非常大。苏家（苏辙）的后代在南宋初年就迁移到了婺州居住。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婺州有7个为科举教育而设的私人印书处，在婺州，人们对苏轼文章的兴趣很浓，也大量翻刻苏轼的著作。现在传世的《精骑集》虽然只有3卷，但其中引用苏轼阐释《易经》思想的著作《东坡易传》的内容，可以说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分。在当时的婺州，苏轼的文章不仅为科举所用，而且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。”——讲座：《士人社会的形成如何改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》

一种超越了主观性的立场，但他同时又保持着一位生动鲜明、富有人情味、令人难忘的抒情诗人形象，苏轼既承认诗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，同时又质疑自我的地位。苏轼的哲理诗通常表现个人在世界的地位，个人经验的主观性，世态人生的多样性，价值观的多元化，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。苏词‘注重自传性细节描写，赋予了离愁别绪题材以新的力量’。”——《苏轼人生中的言、象、行》

吉川幸次郎 よしかわ こうじろう

日本汉学家



“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苏轼是一个天性自由的人，他能自由地发挥他那博大才能的各个方面。苏轼既是书法名家，又是文人画的创始者之一。他巧于谈论，喜欢谐谑。爱所有的人，又为所有人所爱。他天性豪放，但感觉细腻，喜欢节制。他的诗，从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广博而丰富的才能，不自我限制，在宋诗中，是规模最大的。”——《宋诗概说》

小川环树 おがわ たまき

日本汉学家



“诗就是苏轼休憩歇息的场所，但这不是说他疲于政务，只能以剩余精力和被动的态度作诗而已。苏轼一有作诗意念时，总有一股全新的力量涌上心头。为了捕捉当下的一刹那，他不惜豁出一切。苏轼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，一个唯美主义者。诗人而兼官吏乃至政治家，职务和天职亦能两全其美，这些事情对日本人来说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的。不过，在宋以后的中国，政治家必然是由最高的知识分子充任，苏轼当然不能例外。”——《论中国诗》

浅见洋二 あさみ ようじ

日本学者，宋代诗学方向研究者



“在古代中国，知识分子的言论常与国家统治权力发生冲突，以《论语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了冲突发生时的‘避言’策略。苏轼在当时遭遇‘乌台诗案’，他的大半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自我言论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，其诗歌更是有在言论统制下创作的。苏轼有意识地在公众场合抑制以诗歌为首的言论创作活动，但私下里却反复地互赠书简及诗歌，形成了私密的文本圈域，带来了文学文本形态的多样化。”——讲座：《言论统制与诗歌创作的“避言”传统》

北宋历史大背景

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

文+编 刘小荻 text & edit: Liu Xiaodi

苏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¹，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逝世——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。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（仁宗）年间长大，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（神宗）在位期间做官，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（哲宗）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。——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

苏东坡一生的外在境遇和宋朝政治局势紧密相关。他在宋朝为官，是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和官员，即使屡次被贬谪，离东京汴梁千里之遥，他的一句诗词，也会在很短时间内传遍京城。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的苏东坡，常常“祸从口出”，半生贬谪，银铛入狱，甚至命悬一线。宋神宗死后，太皇太后高氏代政，苏东坡又被重新重用，来到大宋

最高权力的中心。在宋朝多变的朝局中，苏东坡的外在境遇，造就甚至成就了他。

从960年，宋朝在黄河边的汴梁（今开封）建都算起，直到1126年金兵攻陷汴梁，北宋于次年灭亡，北宋国祚167年，共历9任皇帝。早在宋朝建国之初，国运的兴衰就已埋下了历史伏笔。

¹ 林语堂·苏东坡传[M]。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2。



★宋太祖 赵匡胤

- ★大宋开国皇帝，在位16年，享年49岁。
- ★赵匡胤，字元朗，后唐明宗天成年间（927年）生于洛阳夹马营。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，其后郭威废汉建周，得任东西班行首，始入宦途。959年，后周世宗柴荣于北征回京后不久驾崩，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，执掌殿前司诸军。隔年（960年）正月初一，北汉及契丹联军犯边，赵匡胤受命防御。初三夜晚，大军于京城开封府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，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，史称“陈桥兵变”。大军随即回师京城，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，赵匡胤登基，改元建隆，国号“宋”，史称“宋朝”、“北宋”。
- ★在世◎927—976年 ★在位◎960—976年
- ★年号◎建隆：960—963年、乾德：963—968年、开宝：968—976年



★宋太宗 赵炅

- ★北宋第二位皇帝，在位21年，享年58岁。赵弘殷第三子，是北宋开国君宋太祖赵匡胤的胞弟。本名赵匡义，字廷宜，其兄长赵匡胤登基后避讳，改名赵光义，即位时又改名赵炅。
- ★在世◎939年—997年 ★在位◎976—997年
- ★年号◎太平兴国：976—984年
雍熙：984—987年、端拱：988—989年、淳化：990—994年、至道：995—997年



★宋真宗 赵恒

- ★宋朝的第三位皇帝，在位25年，享年54岁。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的第三子，初名赵德昌，最初并非皇位继承人。宋太宗最初立长子赵元佐为太子，但因赵元佐自秦王廷美亡后精神失常，最后被废。太宗本计划立次子赵元僖为太子，但赵元僖又早逝。赵元僖死后，太宗立三子赵元侃为太子，赐名恒，至道三年（997年），宋太宗箭伤复发而驾崩，赵恒继位为帝，是为宋真宗。
- ★在世◎968—1022年 ★在位◎997—1022年
- ★年号◎咸平：998—1003年、景德：1004—1007年、大中祥符：1008—1016年、天禧：1017—1021年、乾兴：1022年



★宋仁宗 赵祯

- ★北宋第四代皇帝，初名受益，宋真宗的第六子，生母李宸妃。乾兴元年（1022年）二月，真宗崩，仁宗即位，时年13岁；1023年改年号为天圣；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中，享年54岁，在位四十一年。
- ★在世◎1010—1063年 ★在位◎1022—1063年
- ★年号◎天圣：1023—1032年、明道：1032—1033年、景祐：1034—1038年、宝元：1038—1040年、康定：1040—1041年、庆历：1041—1048年、皇祐：1049—1054年、至和：1054—1056年九月、嘉祐：1056—1063年

重文轻武

公元960年，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代周立宋。在此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，军士拥立皇帝的事情早已上演过三次，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，后唐废帝潞王李从珂和周太祖郭威。赵匡胤虽然是兵变的受益者，但角色的转变让他开始担心武将对皇权的威胁。因此即位后，赵匡胤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方式，解除了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的隐患。

赵匡胤曾向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坦言：“五代方镇残虐，民受其祸，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，分治大藩，纵皆贪浊，亦未及武臣一人也。”²“不杀大臣及言事官”是宋太祖藏在太庙里的誓言，宋朝后来的皇帝都把这条规矩视作祖训。《宋史·文苑传序》有言：“艺祖革命，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。宋之上文，端本乎此。”以文臣治国的倾向，自宋太祖肇始。

宋朝的中央集权要更甚于前朝，赵匡胤将节度使软禁在汴京，令文臣出守列郡，将吏治、兵权、财政三者从地方统一到中央。以防止五代时期武将行节度使之职，割据一方，专兵专权，最终危及皇权的历史重演，由此宋代重文轻武的格局既定。

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中总结了宋王室的三条“家训”。一是收复北方失地，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；二是不能让军人操握政权；三是宋室既不能荡平

² 南宋·李焘，续资治通鉴长编[M]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。

北寇，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，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，因此优待士大夫，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。

边患威胁

燕云十六州失地难收，始终是北宋执政者的心病。历史的诡谲也在于，北宋最终的覆灭，也与它有关。

“燕云”一名最早见于《宋史·地理志》，燕云十六州，即今北京、天津全境，以及山西、河北北部，包括燕蓟节度使所辖的燕、蓟等十一州，与河东节度使所辖的云、蔚等五州。天福三年（938年），后晋皇帝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。之后的两百年里，中原数个朝代都没能将燕云十六州完全收复。

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了中原和江南，却始终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。契丹族的辽、党项族的西夏和大理段氏等，仍然割据一方。占据燕云十六州的契丹族，早在公元916年，就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了政权，国号“契丹”。947年，辽太宗率兵南下中原，攻占汴梁，灭后晋，耶律德光登基改汗称帝，改国号为“辽”。辽国开创了两院制的政治体制，对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分开统治，主张因俗而治，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同时，也吸收了中原文化。

燕云十六州所处地势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大宋自建国以来，统治者就时刻担忧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长

苏东坡论古

Su Shi's View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

XXXXXXXXXXXXXXXXXXXX

图 李金 图 大雷 图 刘小荻 text: Li Jin illustration: Da Lei edit: Liu Xiaodi

苏轼不仅是一位诗词大家，在历史方面他也颇有建树。虽然没有像同时代的司马光那样编写出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旷世巨作，但苏轼撰写了很多策论，从先秦一直评论到唐代。苏轼的史观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很多策论中，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苏轼进士及第，就是以一篇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折服了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。后来他在北宋为官，留有不少针砭时弊、进言献策的策论。在苏轼传世的近百篇策论中，有他对朝代兴衰和历史人物的评点，其中不少是高妙的真知灼见。

“仁政”的倡导者

.....

在苏轼编写的《东坡志林》中，收录了很多自己写的文章。书中第五卷中有十三篇《论古》，每篇都见解独到。尽管苏轼对不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，持有不同的观点，但其中贯穿始终的思想核心，就是“仁”。

《东坡志林》第五卷开篇，苏轼就抛出一个大胆的论点：“武王非圣人。”周武王伐纣，一般认为是替天行道，乃是义举，这也是周朝开端。但苏轼并不赞同武王伐纣，他认为，尽管纣王暴虐无道，但周武王动用武力讨伐皇帝，就会背上背叛谋逆的罪名，而发动战争又不可避免地使得百姓遭受战乱之苦，所以从维护王朝统治秩序的角度来看，武王伐纣并不可取，因此他不是圣人。

那么，在苏轼的政治理念中，圣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在《上初即位论治道三首》一文中，苏轼写道：“人君以至诚为道，以至仁为德，守此二言，终身不易，尧舜之至也。至诚之外，更行他道，皆为非道。至仁之外，更作他德，皆为非德。”可见，苏轼认为，圣明的君主应该同时“至诚”和“至仁”。他曾描述过这样的理想政治图景：“以仁义救天下，天下既平，神器自至。”可以说，以“仁”来评判历史，是苏轼一贯遵循的理念。

以“仁”为核心，苏轼在史学文章中，旗帜鲜明地反对严刑重典。他在《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》一文中，对主张严峻刑法的梁统表现出明确的反对。只反对还不够，他还说梁统后来因此遭到了报应，两个儿子死于非命，其孙梁冀遭遇灭族之祸。与此相对，苏轼却很赞许汉相王嘉：“嘉，贤相也，轻刑，又其盛德之事。”王嘉治理国家轻用刑罚，因此得到了苏轼的高度肯定。

苏轼反对严刑重典，也体现在他对商鞅变法的评论中。在《赵高李斯》一篇中，他写道：“自商鞅变法，以殊死为轻典，以参夷为常法，人臣狼顾胁息，以得死为幸，何暇复请！方其法之行也，求无不获，禁无不止，鞅自以为轶尧、舜而驾汤、武矣。及其出亡而无所舍，然后知为法之弊。夫岂独鞅悔之，秦亦悔之矣。”

在《七德八戒》一文中，苏轼以齐桓公、管仲、楚成王、汉高祖、晋武帝、苻坚、唐明皇等人为例，说这些人虽然手握权力，却并不滥杀那些可能谋逆或者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。苏轼评论说：“皆盛德之事，可以为万世法。”反之，苏轼批评汉景帝、曹操、晋文帝、晋景帝、宋明帝、北齐后主、唐太宗、武则天等帝王滥杀无辜。他称这种举措属于“皆未病而服药者也”，“可以为万世戒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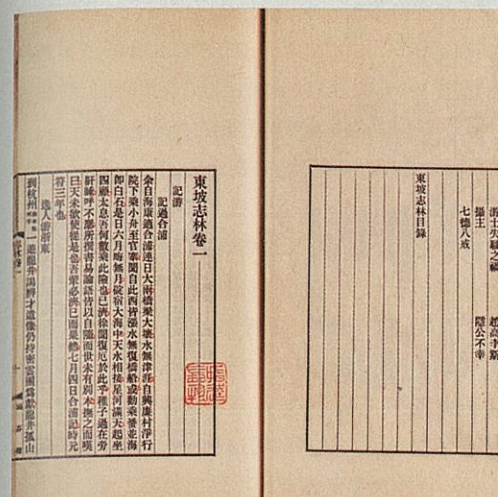
1 策论：古时候议论当前政治问题，向朝廷献策的文章。 2 参夷，指古代诛灭三族的酷刑。

《武王非圣人》（节选）

武王克殷，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，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相禄父治殷。武王崩，禄父与管、蔡作乱，成王命周公诛之，而立微子于宋。

苏子曰：武王非圣人也。昔孔子盖罪汤、武，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，故不敢，然数致意焉，曰：大哉，巍巍乎，尧、舜也！“禹，吾无间然”。其不足于汤、武也亦明矣，曰：“武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又曰：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伯夷、叔齐之于武王也，盖谓之弑君，至耻之不食其粟，而孔子予之，其罪武王也甚矣。此孔氏之家法也，世之君子苟自孔氏，必守此法。国之存亡，民之生死，将于是乎在，其孰敢不严？而孟轲始乱之，曰：“吾闻武王诛独夫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自是学者以汤、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，皆孔氏之罪人也。

◎周武王（？—前1043年），姬姓，名发，谥武，西周第一代天子，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珣。是西伯昌与太妣的嫡次子，其正妻为邑姜，西周的创建者。传统上，周武王，周文王，尧舜禹和商汤一向为后世儒家人物所尊崇的古代先秦明君。



◎《东坡志林》◎宋◎苏轼

◎民国涵芬楼铅印本

◎《东坡志林》所载为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，内容广泛，无所不谈。其文则长短不拘，或千言或数语，而以短小为多。皆信笔写来，挥洒自如，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。其中卷五有“论古”13篇，囊括有苏轼的史学观和对历史人物的评点。

痛恨“小人”的君子

.....

苏轼主张实施“仁政”，是对民众和百姓的宽仁，而不是对奸邪小人的姑息。比如，他坚定地支持孔子诛杀少正卯。在《孔子诛少正卯》一文中，苏轼说，对少正卯这种小人，就是要毫不留情快速解决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
苏轼评论春秋时的鲁隐公，写有《隐公不幸》一文。鲁惠公死后，鲁隐公掌权，他遵从鲁惠公遗志，后来还政于鲁桓公，可谓仁；但鲁隐公对乱政的公子翬没有及时诛杀，而是姑息隐忍，最终导致杀身之祸，是非常不明智的。苏轼总结说：“君子之为仁义也，非有计于利害，然君子之所为，义利常兼，而小人非是。”苏轼认为，君子在行“仁义”的时候，要区别对待各种情况，要运用智慧趋利避害。这与孔子所说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的意思一致。

苏轼意识到君子和小人对国家兴衰具有截然不同

的影响，所以，统治者一定要善于区分君子与小人，不能被小人所蛊惑，而使君子遭祸，最终连累国家受到损害。在《张仪欺楚商于地》一文中，苏轼有“则其所以事君者，乃不如张仪之事楚”之叹。他指出，小人欺骗国君，不仅有像张仪这种以土地做虚假承诺，还有他们所提出的政策举措利害难辨，如果国君没有辨别力，错误地实施了这些举措，很可能会祸国殃民。

“仁”与“智”并重的主张

.....

苏轼指出历史上国家的兴亡，很多都是智力博弈的结果。因此他特别看重掌权者的“智术”，认为治理国家需要“仁”与“智”并用。在《裴颢对武帝》一文中，苏轼称晋惠帝、晋怀帝、晋愍帝三人“牛系马后，岂及亡乎”，意思是这三个人不够聪明，不懂智术，他们当了皇帝，招致灭

美食家苏东坡：自笑平生为口忙

Su Shi as a Epicure

文 许若瑾 图 解诗梵 编 刘小荻 text: Xu Ruojin illustration: Xie Shifan edit: Liu Xiaodi

中国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便已将饮食与诗歌、政治思想、养生之道联系在一起。例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，便以“说汤至味”的故事来说明任用贤才的治世之道。到了北魏末年，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详细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烹饪技术。不过如果要论历史上饮食文学的大家，就不能不提苏东坡，他的厨艺和文采同样青史留名，而东坡的饮食文学创作又与北宋时的民间生活紧密相连。

北宋年间，随着农业的进步和经济的日趋繁荣，烹调技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不仅煎烤炸爆等烹饪手法基本完善，厨具和餐具也丰富完备。虽然苏东坡因“一肚子的不合时宜”在政坛上颇为坎坷不顺，但北宋高度成熟的市井饮食文化，总算是给了他的心灵些许安慰。

宋代奠定了现代中国人饮食文化的基石，自宋朝伊始，“一日三餐”才在民间普及，在此之前多实行二餐制，即晌午一餐，傍晚一餐；至北宋时期，几个重要因素促使人们可以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，一是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；二是商业经济繁荣，百姓更加富足；三是宵禁解除，人们的夜生活更为丰富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详尽记载了汴梁饮食店铺的繁荣：“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”“凡饮食，时新花果，鱼虾蟹鳖，鹑兔脯腊，金玉珍玩衣著，无非天下之奇。”随着里坊制的打破和宵禁令的解除，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夜生活，进而催生出各类熟食小吃和酒水茶点，城市里的饭馆和酒楼终日熙熙攘攘、络绎不绝。

苏东坡写有《老饕赋》，是一首极富人间烟火味的饮食赋：

庖丁鼓刀，易牙烹熬，水欲新而釜欲洁，火恶陈而薪恶劳。九蒸暴而日燥，百上下而汤糜。

尝项上之一脔，嚼霜前之两螯；烂樱珠之煎蜜，滃杏酪之蒸羔；蛤半熟而含酒，蟹微生而带糟。盖聚物之夭美，以养吾之老饕。婉彼姬姜，颜如李桃，弹湘妃之玉瑟，鼓帝子之云璈，命仙人之萼绿华，舞古曲之郁轮袍。引南海之玻黎，酌凉州之葡萄，愿先生之耆寿，分余沥与两髦。候红潮于玉颊，惊暖响于檀槽，忽累珠之妙唱，抽独茧之长缲；闵手倦而少休，疑吻燥而当膏。倒一缸之雪乳，列百柸之琼艘。各眼滟于秋水，咸骨醉于春醪。美人告去已而云散，先生方兀然而禅逃。响松风于蟹眼，浮雪花于兔毫。先生一笑而起，渺海阔而天高。

东坡好肉，被贬至偏远的海南时，对于海南取之不尽的生蚝，他特地研制了烹饪方法，一是把生蚝肉与浆加上水和酒一起蒸煮；二是取蚝肉烧烤，肉熟后随口咽下：

海蛮献蚝，剖之，得数升，肉与浆入与酒并煮，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。

苏东坡还挑战过一般人少敢尝试的田鼠、蝙蝠和蛤蟆肉：



土人顿顿食薯芋，荐以薰鼠烧蝙蝠。初闻蜜唧尝呕吐，稍近蛤蟆缘习俗。

说起苏东坡最负盛名的一道菜，也许就是秘制“东坡肉”了。宋代人周紫芝在《竹坡诗话》中有记载：“东坡性喜嗜猪，在黄冈时，尝戏作《食猪肉诗》。”

黄州好猪肉，价钱等粪土。富者不肯食，贫者不解煮。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

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用文火炖肉，火候得当，肉就自然味美了。除了好食肉，苏东坡还亲自掌勺，改良素食的烹饪方法，“东坡羹”“东坡豆苗”“东坡豆腐”便是他的一系列素食名菜。

东坡爱豆腐，在黄州时，经常亲自下厨做豆腐，招待亲友。豆腐配蜜酒，也是苏东坡这个会吃的老饕想出的绝妙搭配，他留有《密酒歌》：

脯青苔，炙青蒿，烂蒸鹅鸭乃匏壶，煮豆作乳脂为酥，高烧油烛斟蜜酒。

豆苗的烹饪方法，苏东坡也有独到的心得：

豆荚圆而少，槐芽细而丰，点酒下盐酸，缕橙薤姜葱。

摘下豆苗嫩叶，洗净后以香油炒熟，加入盐、酱、橙皮、生姜和葱花调味，做成上好的下酒小菜。

苏东坡在为僧人惠崇画的《春江晓景图》中，题了

苏东坡与苏洵：苏氏文章擅天下

Su Shi and His Father Su Xun

图 景胜 编 刘小荻 text: Jing Sheng edit: Liu Xiaodi

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，彼既老，犹悔迟，尔小生，宜早思。

◎苏洵(1009—1066年)

苏洵，字明允。北宋文学家，四川眉山人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，父子三人被称为“三苏”，均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，有《嘉祐集》传世。曾任校书郎、主簿等微官，追赠为光禄寺丞。



公元1056年的春天，这位《三字经》中的“苏老泉”正带着两个儿子穿剑阁、越秦岭，迢迢千里，从蜀地眉州的眉山出发，赶往北宋的都城汴梁。那时他已经47岁，出川之路的险峻雄奇，早已不再令他感到兴奋。这条路，他29岁时走过，去京师礼部考取进士，铩羽而归；回来苦读八年之后，37岁再次进京参加制科考试，依旧无功而返。此时已年近知命，苏洵苏老泉知道，通过考试而达功名这条路，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条死路，一切还需另想办法。好在这次，他的怀里揣着“办法”。

——《三字经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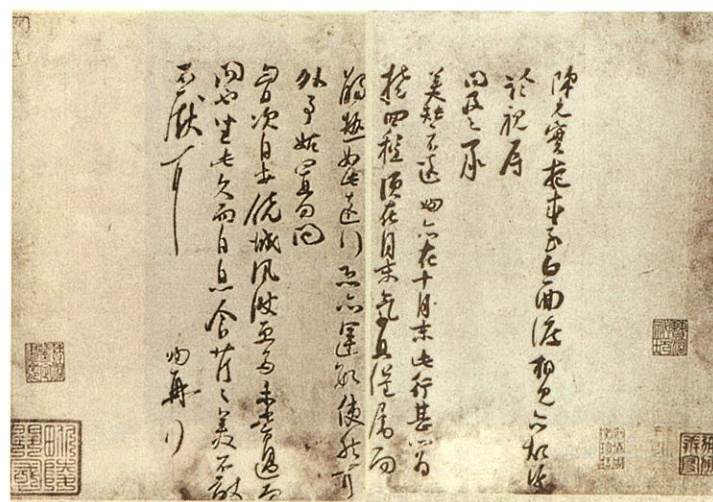
发奋

苏洵的身边，有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一路相伴，蜀道虽艰，黄鹄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猴欲度愁攀援，但对于第一次走出蜀地的两兄弟来说，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。看着儿子们年轻又兴奋的脸，苏洵神思千里——就在他们兄弟俩这个年纪时，自己却以虚掷光阴、浪荡山水闻名乡里。

在眉山镇，苏家本是大姓旺族，尤其是在苏洵的哥哥苏涣高中进士后，苏家带动当地兴起科考之风，可苏洵反倒是个例外。他也在幼年开始读书，学习断句、作诗文，但很快就放弃了，因为苏洵天性好任侠与壮游，终日嬉游，不知有生死之悲。奇怪的是父亲苏序也不急，对儿子纵而不问，“非忧其不学也”，并不为此担心，知子莫若父，在苏序看来，儿子天性难束，吟诗作赋、写骈体文、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，这些都是苏洵不擅长的，就随他去吧。这种情况直到苏洵19岁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氏结婚之后，依旧没有改观。

据苏洵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说：“洵少年不学，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，从士君子游。”大约在得了长子之后，对于读书，苏洵的态度才严肃起来，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哥哥，自己的内兄，还有两个姐夫，都已考取功名，行将为官做吏，因而觉得含羞带愧，追悔韶光虚掷。原本苏洵看与他同辈的人，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，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，但在苦读两年之后，第一次应乡试举人，他却不幸落第。这次失败，使他痛自检讨，再搬出几百篇自

陈元实夜来至白面渡相晃。亦烦渠
诊视，辱
问及之。承
美替不远，洵亦在十月末。此行甚以为
挠，回程须在月末。气且仅属，而
触热如此远行，恐亦运数使然耳。
外事姑置勿问，
胸次自安。饶城风波更多，未尝过而
问也。坐此久而自息。食芹之美，不敢
不献耳。
洵再拜。



◎《陈元实夜来帖》

◎宋·苏洵

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◎《陈元实夜来帖》约书于庆历七年(1047年)，苏洵庆历七年举制策不第，对他打击沉重，返回家乡眉山后，十年未再出蜀地，潜心苦读，直到嘉祐元年(1056年)携苏轼、苏辙二子赴京应试。《忆山送人》诗云：“到家不再出，一卧辄十年。”故帖云“恐亦运数使然耳”，表达了苏洵的郁郁不得志。

己的旧作细读，不禁喟然叹道：“吾今之学，乃犹未之学也！”愤然将这批旧稿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取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、韩愈文来从头再读。就在他立誓读书未成熟前，不写任何文章的第二年，苏轼出生了。

榜样

北宋景祐三年(1037年)，苏轼出生，三年之后，苏辙出生。所以对于大苏小苏两兄弟来说，从睁眼记事开始，身边就一直有一个读书人的榜样，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苏洵。

相传苏洵发愤读书后，态度和以前迥然不同。有一年的端午节，程夫人看他一直待在书房里，连早餐也忘了，特地剥了几只粽子，连一碟白糖，送去书房，没有打扰他便悄悄地走开了。近午时分，收拾盘碟时，发现粽子已经吃完，糖碟原封未动，然而砚台的四周却残留了不少的糯米粒；苏洵的嘴边也是黑白斑斑，黑的是墨，白的是糯米粒。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，把砚台当成糖碟，蘸在粽子上的，是墨不是糖。

除了以身作则外，苏洵还吸取了自己青年荒废的教训，决心不让这一幕在儿子身上重演。苏轼7岁入天庆观北极院小学读书，以道士张易简为师。虽然他头脑异常聪明，但孩子天性里的调皮也尽显无疑。据传为了培养他读书的兴趣，苏洵常常特意在两个儿子玩耍时，出现在一个他们看得到的角落看书。两兄弟好奇，跑过来看父亲在做什么。苏洵每每故意慌慌张张地把书藏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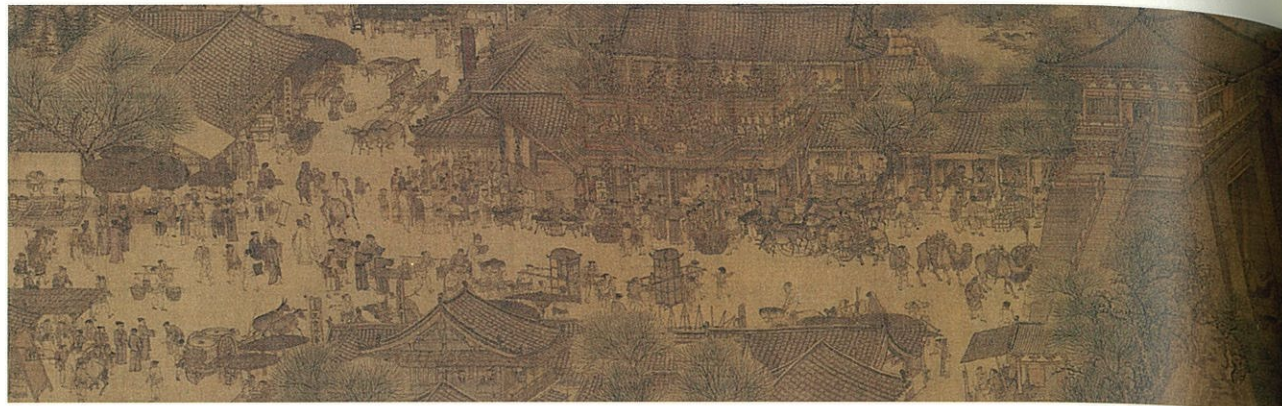
来，于是两兄弟更好奇了，想方设法去偷书看。由于本身天资聪慧，二人就此渐渐都迷上了读书。苏辙曾回忆说：“惟我与兄，出处昔同；幼学无师，先君是从；游戏图书，寤寐其中。”

赶考

就这样父子相伴六七年，每日父亲苏洵端坐书斋，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；儿子承膝绕前，渐入门径。苏轼十来岁时，已能写出“人能碎千金之璧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”之句。

十年寒窗，37岁的苏洵再度从眉州出发，下夔州过巫峡，前往京师参加制科考试，意欲求取一份应属自己的荣耀，但却依然未中。尽管及至后来苏轼苏辙同登科第之后，苏洵自嘲又骄傲地留诗说：“莫道登科易，老夫如登天，莫道登科难，小儿如拾芥。”但在当时，这次考试的失利，对苏洵的打击是致命的，他决心自此再不入考场。

归来之后的苏洵依旧用功不辍，只不过不再心存科考之念，读书为的是自己喜欢，也为两个儿子铺路，他引导苏轼两兄弟说：“士生于世，治气养心，无恶于身，推是以施之人，不为苟生也，不幸不用，犹当以其所知，着之



26

北宋风俗人情：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

The Local Custo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

文+编 刘小荻 text & edit: Liu Xiaodi

苏东坡生活的北宋，商业繁荣，市井文化丰富。他19岁初到都城东京汴梁，进士及第，名动京城，风光无限，经历过汴京的富庶繁华，在酒楼酒肆会友，在街巷里弄畅游；元祐年间，在历经颠沛流离的游宦生涯后，又被太皇太后高氏重用，重新回到大宋的政治中心——东京汴梁。

汴梁是北宋的都城，最鼎盛的时期拥有100多万人口，而直到工业革命之后，伦敦才成为欧洲第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城市，所以说宋朝的汴京无疑是个世界级的超级城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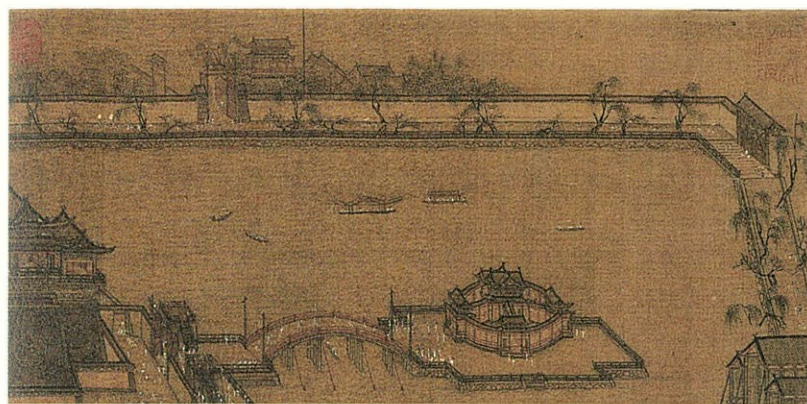
要探寻千年前的北宋图景，市井街道的布局，店铺商户的纷繁，往来宋人的状貌，民风民俗的考究，可供今人参考的图文资料，当然要提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和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它们一个是再现了千年前汴京风貌的传世名画，一个是包罗万象的风俗录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有宋徽宗政和、宣和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，囊括了城郭河流、街巷店肆、岁时民俗、市井游观等东京汴梁的方方面面。

正当辇毂之下，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。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；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。时

节相次，各有观赏：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，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；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；箫鼓喧空，几家夜宴。伎巧则惊人耳目，侈奢则长人精神。

孟元老在写《东京梦华录》时，已是南宋，金兵铁蹄下的汴京，失去了昔日繁华。偏安一隅的南宋，苟延残喘在紧张不安的外部局势里。孟元老是北宋遗民，他带着复杂的心情追忆汴京旧事，在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序言中，有一段让人慨然的回叹，孟元老说了他之所以写这本书的前因：



●《金明池争标图》●宋●张择端

●天津市博物馆藏

◎此图描绘北宋京城汴京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金明池水戏争标的场面。全图约有千余人，虽然人物微小如蚁，但仔细观察，比例恰当，姿态各异，神情生动，颇具艺术魅力。在图左下角的粉墙上有楷书小字“张择端呈进”五字款。画中描绘的景物、活动与宋孟元老所撰《东京梦华录》中《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》《驾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》记载基本吻合，因此又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。

一旦兵火，靖康丙午之明年，出京南来，避地江左，情绪牢落，渐入桑榆。暗想当年，节物风流，人情和美，但成怅恨。近与亲戚会面，谈及曩昔，后生往往妄生不然。仆恐浸久，论其风俗者，失于事实，诚为可惜。谨省记编次成集，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。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，其乐无涯者。仆今追念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？目之曰《梦华录》。

●《清明上河图》●宋●张择端

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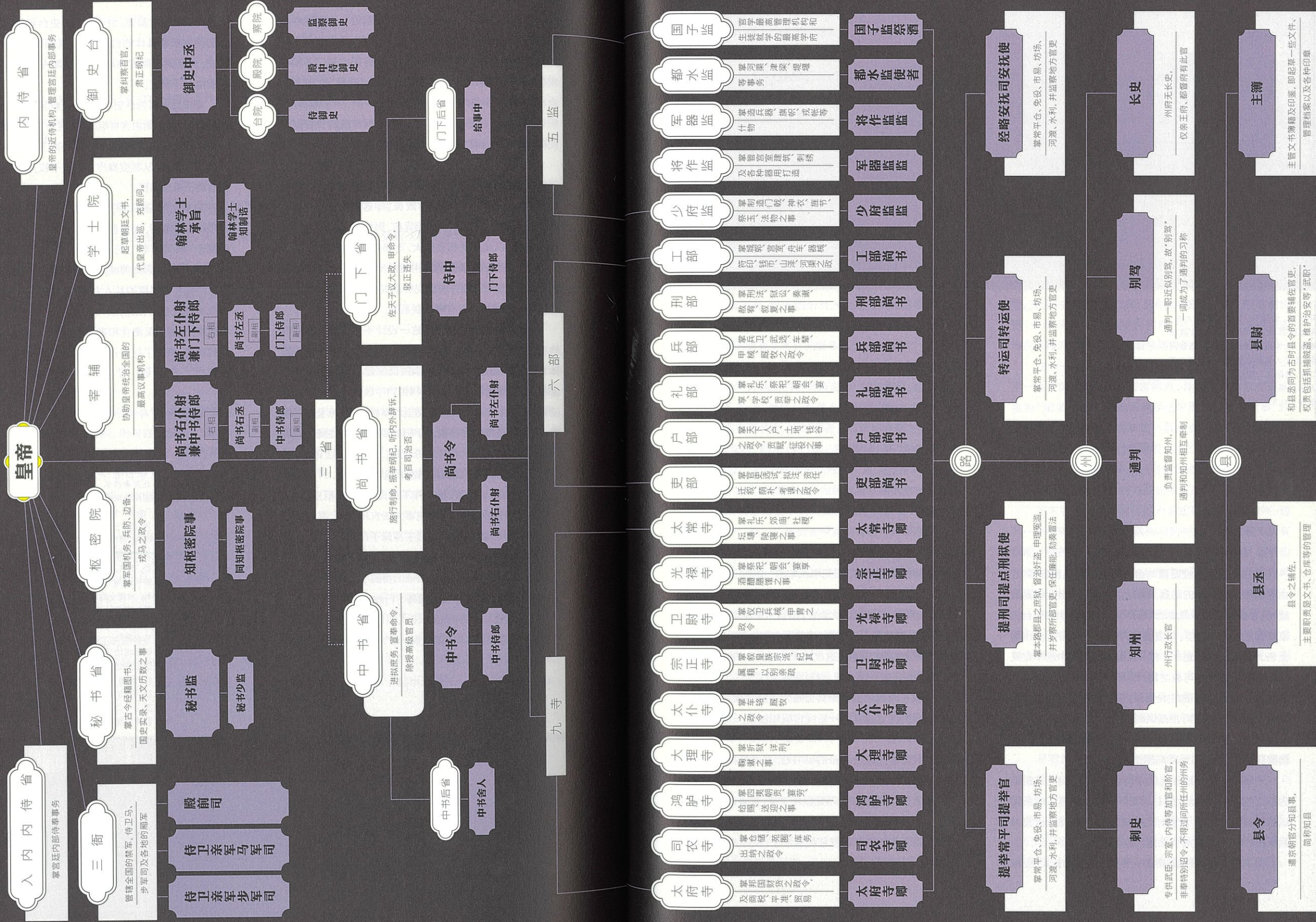
◎《都城纪胜·市井》载：

自大内和宁门外，新路南北，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，悉集于此；以至朝天门、清河坊、中瓦前、潘头、官巷口、棚心、众安桥，食物店铺，人烟浩穰。其夜市除大内前后，诸处亦然，惟中瓦前最胜，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，与日间无异。其余坊巷市井，买卖关扑，酒楼歌馆，直至四鼓后方静；而五鼓朝马将动，其有趁卖早市者，复起开张。无论四时皆然。如遇元宵犹盛，排门和买，民居作观玩，幕次不可胜纪。隆兴间，高庙与六宫等在中瓦，相对今修内司染坊看位观。孝宗皇帝孟享回，就观灯买市，帘前排列内侍官帑行，堆垛见钱，宣押市食，歌叫支赐钱物，或有得金银钱者。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，市店遭遇者，如李婆婆羹、南瓦子张家圆子。若遇车驾行幸，春秋社会等，连檐并壁，幕次排列。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（旧名南仓前）诸色路岐人，在此作场，犹为骈阗。又皇城司马道亦然。候潮门外殿司教场，夏月亦有绝伎作场。其他街市，如此空隙地段，多有作场之人。如大瓦肉市、炭桥药市、橘园亭书房、城东菜市、城北米市。其余如五间楼福客、糖果所聚之类，未易缕举。

“避地江左，暗想当年，追念往昔，回首怅然”，孟元老言及从自己在崇宁癸未（1103年）入京师，到靖康丙午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陷汴京，其间只有短短23年。古人梦游华胥之国，而如今追忆陈年往事，回首怅然，如大梦一场。

华胥一梦，就让我们跟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和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回到千年前的北宋都城汴梁，一起来看看这昌明隆盛之邦，花柳繁华之地，温柔富贵之乡。

据《宋史·职官志》作



苏东坡与20世纪中国学人

Su Shi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

☒ 常上永 编 刘小荻 text: Chang Shangyong edit: Liu Xiaodi

有关苏东坡的研究自他去世后便已经陆续展开。南宋以来的学者对苏东坡本人及其传世作品都保有极大

热情，其间最为重要的当属清代学者查慎行、冯应榴、王文诰先后推出的三部苏诗注本。

冯应榴的《苏文忠公诗合注》堪称苏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。冯氏为乾嘉时学人，家学深厚，父亲冯浩和弟弟冯集梧均为当时集部研究的佼佼者。其注释能博采诸家之说，截断众流，考证精详，并由钱大昕作序推奖，为后代研究做出了极为扎实的贡献。此外，翁方纲、沈钦韩等学者均在这一领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，清代因而也成为苏东坡研究最为繁荣的时代。

1900—1949：

艰难的转型

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，这一时期对于苏东坡的专门研究并不算突出。伴随着白话文运动，新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也出现了，以进化观来阐释文学史的方法风行一时。

在胡适等人的文学史叙述中，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被视为两条斗争的线索，其中平民文学是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始终的鲜活脉络。胡适20世纪20年代初的讲义《国语文学史》在这一视野下对苏东坡予以了很高的评价：“苏黄诗的好处并不在那不调的音节，也不在那偏僻的用典。他们的好处正在于‘做诗如说话’，因为要做到‘做诗如说话’，故不拘守向来的音调格律。”

胡适认为，欧阳修、苏东坡等人所参与的北宋古文运动正是对贵族文学的反拨，尽管他们未能进行彻底的改革，却使“白话的文学仍旧继续地发展”。这俨然把苏东坡作为胡适诗论在古代的代言者了。此后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涉及苏东坡和宋诗的文学史著作，都从这一角度立论，肯定苏东坡的文学贡献。如20世纪30年代胡云翼的《宋诗研究》，即以“现实主义”赞扬苏东坡对此前形式主义文学的反拨，

正因如此，苏东坡才在其所处的时代开辟出宋诗的新道路。

苏东坡在文学进化观的视野下受到推重，但同样的文学材料在不同的阐释者看来，依然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面貌。宋诗的学理性和议论性向来为一般阅读者所诟病，尤其在当时“平民文学”几乎成为首要评判标准的时期，苏东坡、黄庭坚的大多数诗歌创作难以与此时的文学思潮互恰。在陆侃如、冯沅君夫妇的名作《中国诗史》中，非平民化的宋诗索性被直接抹去不谈。宋诗研究和苏东坡研究在这一时期陷入低谷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

胡适 (1891—1962)

读苏诗的人，须知道他的好处不在能用“玉楼”、“银海”一类的典故，而在能用“牛矢”、“牛栏”一类极平常的事物做出好诗来。他的律诗之中那些好的也只是用说话体来做诗。

吕思勉《宋代文学》(1929年)、胡云翼《宋诗研究》(1930年)、梁昆《宋诗派别论》(1938年)都从文学演进的视野着眼，指出苏东坡在文学创作上对前一时期的超越与开拓。吕思勉先生指出：“宋人于诗之体制，亦能出于唐人之外。而其意境、字面则专与唐人判然不同，后人于诗，非宗唐，即宗宋，至今未能出此两派之外焉。”



吕思勉 (1884—1957)

三苏之文，大致相同，而亦各有特色：笔力强劲，自以老泉为最。然老泉好纵横家言，恒以权谲自喜，而其言实不可用……而东坡实能

见事理之真。故其冰雪聪明处，实非老泉所及。尤妙在能以明显之笔达之。

这些事实上依然是传统诗论中“诗分唐宋”的观点，对于苏东坡“以文为诗”的风格分析同样是续前人之论。较有新意的观点是对宋代文学流派的分析，从文学史发展的线索中指出苏东坡的独特位置，尽管不无文学进化论的痕迹，但确实多平实中肯之论。

这一时期涉及苏东坡的文学史著作，引人注目的创见寥寥可数，其中大多只是停留于单纯的事迹、风格概述或作品注释，远未能真正实现苏东坡研究的现代转型。与此迥然不同的是，那些坚持以传统方式考释、阐述苏东坡作品的学者，却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朱孝臧、龙榆生师生接力完成的名作《东坡乐府笺》(1936年)。朱孝臧是清末四大词人之一，早年在政坛以刚直著称，五十岁后辞官，除文学创作外，还致力于词籍的校勘刻印。晚年共编订词人别集一百六十八种，无不遍求善本加以校勘，后汇刻为《彊村丛书》出版。由他精心校勘编年的《东坡乐府》即在其中，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成为东坡词作的标准文本。

朱孝臧晚年以遗老自居，寓居苏沪一带。1928年，时任暨南大学教员的青年龙榆生与朱孝臧结识，以扎实学养与谦逊品质得到朱氏的“一见叹赏”，并亲授词学。在朱孝臧的悉心指导下，尽管不过短短四年，龙榆生的词学功力大进。1931年12月，朱孝臧因病辞世，临终前将自己的遗稿与朱墨、砚台亲手交付龙榆生，并叮嘱他：“吾未竟之业，子其为我了之。”

此外，同光派诗论家陈衍在《宋诗精华录》《石遗室诗话》中对苏东坡的不少判断时有新见。陈氏标举宋诗，尤其推重苏东坡、黄庭坚，并将苏东坡所在的元祐时代列入中国诗史的三大转关之一（另外两大转关为开元、元和），在今日看来依然值得参考。



朱孝臧 (1857—1931)

从960年至1126年，就是所谓的北宋时代。五代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，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定都汴京以后，中国复归于统一。人民

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，社会经济也渐渐繁荣了起来。可是当时社会的太平情形，掩盖不了当时的各种矛盾。宰相吕蒙正就曾说起：“都城，天资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至此。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，极寒而死者其众。”百姓遭受到这样凄惨的境遇，有良心的诗人是不能熟视无睹的。加上仁宗朝（1034—1044年）对西夏用兵的累遭惨败，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。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如苏轼、黄庭坚等，就把西夏这个敌国刻刻放在心上，而又“甘心赴国忧”的雄途……这些情况反映到使人们的思想情感上，是不容许再像柳永那样，把生活圈子局限在“浅斟低唱”的“偎红倚翠”中了。“关西大漠，铁绰板，铜琵琶，唱大江东去”恰好是适应时代要求，发挥了苏轼的创造性，用来打开南渡诸爱国词人的新局面，这不是什么偶然的。



龙榆生 (1902—1966)

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，遂为词坛别开宗派；此词学史上之剧变，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。轼以才情学问为词，晁补之所谓“横

放杰出，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”。由是而伤今怀古，说理谈禅，并得以词表之，体用遂益宏大。《东坡词》全部风格，王鹏运以“清雄”二字当之（说详《词林考鉴》）；然亦随年龄环境为转移，大约以中年官徐州，及谪贬黄州数年中所作为最胜。

自轼解放词体，而作者个性，始充分表现于词中；其特征则调外有题，不必全谐音律。闻轼风而起者，有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叶梦得、向子諲、陈与义、辛弃疾诸人。

日本的苏东坡推崇者们

The Research on Su Shi in Japan

文 常上永 编 曹岳 text: Chang Shangyong edit: Cao Yue

提及海外的中国研究,难以绕过的就是日本汉学。自19世纪末以来,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史各领域的研究,

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,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交相辉映,培养出一大批杰出学者。然而日本对于苏东坡

的认识与接受,早在苏东坡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就已开始。



◎虎关师炼(1278—1346年)日本佛教禅宗临济宗僧人。作为“五山文学”重要作家,他著有日本首部佛教史书《元亨释书》(共三十卷),此书为后人广泛阅读并研究。十三世纪时,苏东坡的作品已传到日本,据日本东福寺大道以一所编的《普门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》(1353年)里,就有《注东坡词》二册及《东坡长短句》的纪录。苏东坡的作品有禅味,很受僧人欢迎,后来,日本的禅僧学习苏东坡的诗文,比如高僧虎关师炼(1278—1346年)及义堂周信(1325—1388年)都曾在札记里说自己学习苏东坡的作品。

1945年以前的苏东坡研究

苏东坡的作品在12世纪前后已经传入日本,苏东坡亦为日本读者所知。到五山文学时期,在五山诗僧的推崇下,东坡诗文的流传进入极盛期。喜爱苏东坡的诗僧们,不仅自己刻印五山版的苏东坡文集,还出现了专门的“坡诗讲谈师”。

据王水照先生考证:“五山僧的注释本在方式上自成一统,即把王十朋集注分类本拆开,切除边框,逐页粘

贴在较大的和纸上,再装订成册。然后即在和纸上写入自己的见解,或抄录他人的讲述。”五山诗僧通过这一方式,形成了独特的苏东坡研究传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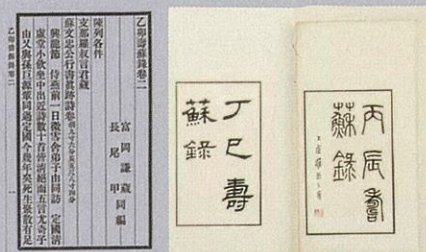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瑞溪周凤《胜说》、大岳周崇《翰苑遗芳》、一韩智翊《蕉雨余滴》、笑云清三《四河入海》等。这批文本不仅是日本研究者的注释心得,其中所保留的大量在中国已经亡佚的文献,具有极为独特的研究价值。

室町时代(1336—1573年)后期至江户时代(1603—1867年),随着中国、朝鲜汉籍刊本的流入和传播,苏东坡作品的阅读变得更为便利。18世纪前期,由于获生徂徕、服部南郭等学者对明代李攀龙、王世贞诗学趣味的推重,日本学者对苏东坡和宋诗有所贬低,这一时段也因此成为苏东坡作品在日本传播的低潮期。

随着诗学观念的变迁,19世纪初,苏东坡诗歌再次兴盛。著名朱子学学者、“宽政三博士”之一的柴野栗山常常于七月既望出游泛舟,以致敬苏东坡在《前赤壁赋》中的相关描写。这一活动在江户时代末极为流行,即使到明治年间依然保有余绪。

受到明清诗学的影响,江户时期是诗话创作的繁荣期。这一时期苏东坡研究的成果散见于各类诗话中,通常以对苏东坡诗学观的探讨为主,或摘抄苏东坡原诗、或摘抄明清人士对苏东坡的评论,但总体而言,具有独创意义的观点并不多。

京都学派的学人最初主要从事中国古史研究,关于苏东坡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,亦尚未真正展开。内藤湖南“唐宋变革论”的提出虽与苏东坡无关,却深深地影响



◎《乙卯寿苏录卷二》、《丁巳寿苏录》、《丙辰寿苏录》寿苏会的首四次的聚会都由长尾甲编成《寿苏录》,分别是《乙卯寿苏录》(1916年)、《丙辰寿苏录》(1917年)、《丁巳寿苏录》(1918年)、《己未寿苏录》(1920年),不公开发售,只派给与会者。寿苏会即特别为苏轼贺寿的聚会。二十世纪初,中日东坡迷举行了五次“寿苏会”,全定于农历十二月十九东坡誕生日当天举行。参与者多是有名的学者,如第一次寿苏会,就有罗振玉、罗福颐、王国维、狩野直喜及内藤湖南等。聚会其间,出席者会发表各自带来的诗文,也会即兴和诗欢愉一番,更有学者携来自己所藏苏东坡相关藏品,展示于同好。

了此后宋诗研究乃至苏东坡研究的思路。

此外,这期间可圈可点的成果,则是一批苏东坡诗歌日译本的先后问世,其中重要的文本有土屋弘《苏诗选详解》、岩垂宪德等著的《国译苏东坡诗集》、大槻彻心《详解苏东坡诗集》等。尽管这批译本未必具有学理性的研究价值,却为苏东坡的文学在日本的传播,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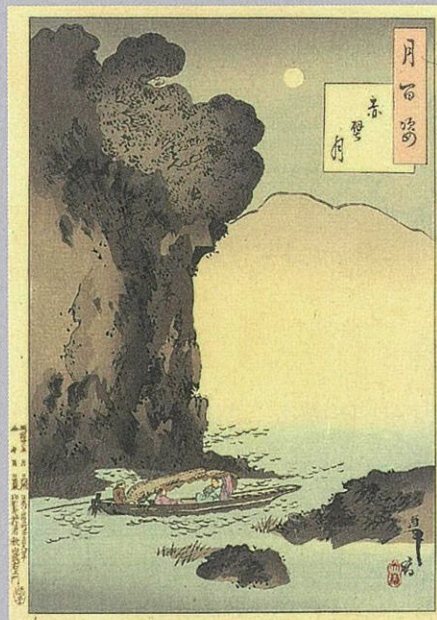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的文人和学者中,曾流行过名为“寿苏会”的活动,即在苏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那天集会,展出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画、典籍、文物等,并共同为苏东坡庆祝生日。

由长尾雨山、富冈铁斋首倡,日本曾于1916—1937年间先后举办五次“寿苏会”,尤以第一次最为盛大,参加的既有内藤湖南、狩野直喜等日本汉学的顶尖人物,又有罗振玉、王国维等中国学人。

这一活动中创作的诗文被编为《寿苏集》。除此之外,所谓“赤壁会”等类似的纪念活动不一而足。这更反映出苏东坡在日本读者心中的特殊地位。

1945—1989年的苏东坡研究

与中国的情况相似,有关宋诗的研究在日本长期未能受到足够重视,即使许多诗人与学者给予苏东坡充分的肯定与尊敬。战后的日本汉学经历了短暂的转折消歇,但很快便恢复了战前的活力。新一代的学人逐渐登上学术



◎《赤壁月》◎月冈芳年《月百姿》◎东坡游赤壁

◎赤壁会,在江户时期以后的日本各地文人因为敬慕苏轼,在壬戌年的七月既望或十月之望,模仿他游赤壁,举行雅会,赋诗作画。日本人很欣赏苏轼的《赤壁赋》,历代文人的诗文翻唱不胜枚举,特别是十八世纪,辛岛盐井(1754—1839年)、赖杏坪(1756—1834年)、万波俊忠(1762—1843年)等人,皆作诗颂扬《赤壁赋》。



◎狩野直喜(1868—1947年),号君山,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,为京都学派的开创者,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小说戏曲研究,其研究所表现的理念、方法论及其所取得的业绩被称为“狩野体系”。代表作有《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》《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》《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》等。



◎内藤虎次郎(1866—1934年),号湖南,生于秋田县鹿角市的儒学世家,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,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。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,曾提出“唐宋变革论”,著作汇编为《内藤湖南全集》14卷。

舞台,在广度和深度上均焕发出超越前辈的魄力。

与宋诗研究的兴起同步,有关苏东坡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展开。在这一时期,两位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学者——小川环树与吉川幸次郎起到了转移风气的重要作用。作为京都学派的嫡传弟子,他们二人交游密切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名,被视为日本汉学的旗帜。

钱钟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大概可以视为激发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。该书于1958年出版,很快在日本学界引起重视,尤其受到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二